



陕甘宁边区工业的一颗明珠(下)

——盐池县元华工厂

由于元华工厂办厂方针明确，生产措施得力，所以发展生产很快，资金积累迅速。从1942年2月投产至1944年8月，工厂生产出各种毛毯600余块、毛毡1500多条、毛巾100多，各式裁绒毯8000余方尺，此外还有毡鞋、毡帽、毛口袋、毛包子、被胎、衣胎、二毛皮衣等产品3600多件。

1942年初建厂时，元华工厂仅有边区建设厅投资的2万元边币。工厂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动员群众入股投资7万余元，至年底资金发展到12万多元，有工人增加到44人，干部4人。到1943年，三边盐务局投资100万元，塞北工厂投资160万元，定边新寨工厂投资3.5万元，盐池县政府投资59万多元，群众自主投资4.6万多元，到年底结算有资金28956000多元。1944年初，群众又集资1120万元，发展资金9000多万元，为元华工厂的扩大再生产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元华工厂白手起家，刻苦经营，不断发展壮大，终于成为边区有名的合作社，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据统计资料表明，仅从1942年到1945年，元华工厂为边区机关干部和前线将士制作衣胎、被胎、绒帽、毛毡、军用毛毯等12万多件，还有大量毛袜、手套、军鞋等。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许多机关干部和战士，戴的是元华工厂制作的绒帽，穿的棉衣是由元华工厂提供的衣胎，元华工厂的功劳是人们难以忘记的。

元华工厂是盐池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综合性的手工业工厂，也可以叫合作社。在办厂过程中，由于领导经营有方，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创造了一套比较先进的管理办法。其中主要是管理的民主性，生产的计划性和按劳取酬的合理性。这次，为三边地区乃至整个边区的工业提供了不少经验，树立了一个好典型。同时，也为经济基础薄弱的盐池县创造了财富，积累了不少资金。

元华工厂是在中共盐池县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创建和生产的，工人们接受了良好思想教育、组织教育和纪律教育，政治觉悟提高很快。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厂内绝大部分青年工人和职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革命的行列。全国解放以后，盐池县委和政府又以元华工厂的老工人为骨干，组建了盐池县毛织厂。新建成的盐池县毛织厂后来发展成为拥有300多名职工，有比较先进的机械设备和工艺技术的厂家，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并且出口创汇。

元华工厂建成后不久，即以先进的管理方法、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对革命的突出贡献而闻名全边区，成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的一颗明珠，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1944年7月，靳体元光荣地出席了中共中央

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和其他16位合作社英雄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解放日报》记录了当时的激动场面：毛主席掀帘进来时，面现和蔼的笑容，频频倾向各英雄点头……毛主席对每一个合作社的特点都很熟悉……当毛主席问到盐池县靳体元先生创办的元华工厂时，靳体元先生充满着兴奋的情感，急促地说：“从前我是商人，可后来我觉得边区需要工业，所以我转到工业上来了。”

1947年，陕甘宁边区遭遇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宁夏军阀马鸿逵紧密配合胡宗南，派兵大举进攻三边。盐池县民亲手创建的元华工厂遭到了惨重破坏。元华工厂被迫停产了。但是，元华工厂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据宁夏档案馆微信公众号)

解放初期银川市市的供给制(四)

实行工资分以后，个人供给部分均比照工资分值计发，各类供给标准更为细致、具体。例如：生活费(包括粮食、菜金、燃料、鞋袜、被子等)，每人每月大灶工资分60分，中灶85分，小灶110分；津贴费，按政务院规定的干部职别、级别及其他具体条件，各级干部每人每月津贴在216至17个工资分之间；服装费，单衣每套工资分36分，棉衣每套75分，棉大衣每件60分，蚊帐每顶60分；老年优待金，改原优待金为优待工资分。区长级以下人员，根据其参加工作年限，每人每月优待8至14分不等。另外，对妇婴费、保育费、保姆费、病号补贴、家属招待费、医药费、过节费、干部家属补助费等等，均有较为详细的工资分补助规定。不作一一细述。在个人供给改按工资分计发的

同时，公用开支部分的供给，也改按工资分配薪或实物计发。例如：办公费，包括文具、纸张、账簿、表册等及一般邮费、零星招待费、小型修缮购置费、饮水燃料费等，按市、县级干部每人每月12分、区级干部每人每月9分、勤杂人员5分的标准供给。文化娱乐体育活动费，在不超过每人每月3分的范围内，由机关自行调剂掌握；电费，直流电话单机每部每月25分。直流收音机每部每月120分；学习书报费，每人每月5分；骡马用费，银川平原地区骑用骡马，每匹每月按8分计算。驮用骡、马，每匹每月10分。一般拉车骡、马，每匹每月13分。拉大股车骡、马，每匹每月18分。骆驼、牛、驴，每峰(头)每月均按7分计算。其余还有水电费、调干公杂费、汽车费、烤火费、差旅(调

遣)费、会议费、埋葬费、临时特别费等项，均按工资分配薪或实物计发。这种办法先后沿用了四年。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制和党、政、群、团的办公所需费用，全部由财政部门以行政经费支出。1949年第四季度，全市行政经费支出7488元，全部由省财政厅拨付，占财政总支出的100%；1950年行政经费支出11.2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7.37%；1951年支出18.68万元，占总支出的81.6%；1952年支出40.26万元，占总支出的59.63%；1953年支出45.93万元，占总支出的52.05%；1954年支出54.89万元，占总支出的30.34%；1955年支出44.8万元，占总支出的54.04%。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国家经济情况的逐步好转，银川市的行政经费支出也在逐年增加。也

就是说，银川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单位的办公条件，都在逐年改善和提高。

在国务院的统一安排部署下，自1955年7月1日起，银川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了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解放以来实行了5年零9个月的供给制度，从此废除。其时，银川市的工资名额控制数已达436人。

银川市实施供给制，是解放初期财政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保证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所采取的比较节省而又能保障供给的有效办法。从银川市供给制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初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精打细算、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品质和精神，是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的。(据银川党史网)

激战涝河桥(上)

夏兵团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为迟滞解放军前进，马鸿逵得力干将、河东国民兵团司令马得贵指挥国民兵团和沿汉渠防守的一二八军所属三五六师部队，将千年古渠(汉渠)掘开30余处，并将渠上桥梁全部破坏。顿时，金积县西南20余里的地区，黄河水泛滥成灾，淹没稻田1.4万余亩，冲毁民房600多间。敌人掘堤放水的行为虽给解放军前进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根本无法阻挡解放军前进的步伐。

北路解放军一九一师五七三团夜袭牛首山，夺取青铜峡之后，9月20日拂晓，又奉命强攻中宁通往金积的咽喉要道余家桥。国民党宁夏兵团所属贺兰军保安二师二团倚仗汉渠堤坝、城镇、村庄等有利地形和事先构筑的工事，在此负隅顽抗，阻击解放军。五七三团不畏艰险，按预定时间实施强攻。到14时，五七三团在团长杨守愚、政委权仁的指挥下攻占了黄营、沙寨、刘家营、毛家寨、贾家寨、李家堡、西滩村和保安一师一团团部——董府。一九一师师部进驻董府。

南路解放军一九二师从牛首山东侧挺进，在击溃马骑兵的多轮冲锋后，于9月19日傍晚先后攻占沙渠梢子、侯家湾等地，抵达汉渠南。20日晨，涉水发起攻击，突破汉渠防线的南线，先后攻克徐家湾、马莲渠、田家桥等地。至14时许，逼近金积县城，配合一九一师对金积县形成合围之势。同时，一九一师五七一师与独立一师、独立二师沿豫旺、灵武公路疾进，协同迂回包抄吴忠堡。

为彻底打破国民党宁夏兵团顽固势力的梦想，解放军一九一师、一九二师迅速挥师北上，实施歼灭吴忠堡之敌，并切断金积县守军逃跑的作战计划，将包围金积县城的任务交给了随后跟进的一九〇师部队。五七一师、独立一师、独立二师迂回到吴忠堡东北，形成了合围吴忠堡驻守敌军的之势。

此时，金积城内守敌被解放军一九一师、一九二师、独立一师、独立二师、一九〇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

退路断绝。见援兵无望，守敌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霆等大部分官兵利用混乱偷逃出城。金积守军指挥官崔清平、谢修臣见大势已去，决定向解放军求和，城内敌军全部溃散。21日凌晨，400多名毫无组织的守城敌兵缴械投降，金积县城解放。1949年9月23日，在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中共金积县委和政府成立，首任书记王廷栋、县长李波。

解放宁夏战役的最后一战中，要数涝河桥之战最惨烈。金积解放后，六十四军指挥员果断作出包抄决定，围歼吴忠堡的国民党卢忠良的一二八军。解放军一九二师在师长马卫华的率领下，摸黑绕过金积城，蹑足水淹地带，经廖桥、巴浪湖、杨马湖挺进吴忠堡东南的涝河桥一带，与先期到达吴忠堡东北侧五七一师和独立一师、独立二师对吴忠堡守军形成夹击之势。

敌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保三师师长周福才得知此情报后，马上派马进禄部的2个装备精良的步兵连，破坏公路，拆掉桥梁渡槽，加强了对涝河桥的防守。

9月20日晚，当解放军五七五团扫清清水沟南岸敌军据点时，一九二师主力也逼近了吴忠堡。敌军保三师第九团团长刘瑞祥派师部联络参谋张永和协同副团长罗俊忠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前阵阵地与解放军联络……当夜，涝河桥四周死一般寂静，解放军指战员克服昼夜连续作战带来的疲劳，坚守在阵地上。五七五团指挥员一面与敌军代表张永和谈判，一面命令侦察参谋刘斌带2名侦察员迅速查明水情及架桥位置，同时令该团一营积极进行战斗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实施强攻。

一营三连接受攻打敌桥头任务后，利用夜色，进入河岸观察敌情、地形，研究了战斗方案，决定采取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战法，攻歼桥头碉堡群守敌。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三连用门板、梯子等制作成架桥器材，21日2时许完成战斗准备。21日晨，在敌人拒绝放下武器的情

况下，解放军五七五团一营三连发起攻击。驻守桥头的一连守敌，凭借距桥主体西北近300米处的1座高碉、4个地堡为主体的坚固碉堡群工事，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加上敌人事先阻塞清水沟下游，造成涝河桥附近水势暴涨，致使解放军三次架桥强攻均未成功，三连伤亡较大。五七五团组织火力，发射炮弹，将守敌对解放军威胁最大的机枪火力点摧毁。在炮火的掩护下，架桥排迅速跳入水中架桥。突击队过桥后迂回到敌后，用炸药包炸毁碉堡，占领了桥头。解放军大部队过桥后分路猛追，经数小时激战，于吴忠堡外围俘敌千余人，将敌保安三师防线全部摧毁。与此同时，一九一师集中优势兵力突破吴忠堡东南门，与迂回吴忠堡东北之独立一师、独立二师等部队配合，在吴忠堡外围歼灭大量敌军。历经两个多小时，解放军指战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清水沟涝河桥南岸，桥头两侧有许多战士倒在血泊中，桥下的水被战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解放军在清理作战阵地时，发现有135名战士英勇牺牲，其中45名战士的遗体被水冲走。

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驻守吴忠的敌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和五五六师师长马福元扔下部队于21日清晨偷偷逃往河西岸的银川。当日11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一九二师五七一师(原属一九一师)、独立一师突进吴忠堡。吴忠堡宣告解放。中午12时，一九一师主力部队浩浩荡荡从吴忠堡东门开进城，群众纷纷涌上街头，夹道欢迎解放军。

9月19日至21日的吴忠之战，歼灭国民党宁夏兵团主力一二八军，共毙伤敌165人，俘敌73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4门、汽车23辆、各种枪支7869支，以及各种弹药110多万发。吴忠之战是解放宁夏的关键性战斗。涝河桥激战突破了国民党宁夏兵团精心设计的汉渠防线北段，奏响了吴忠之战的前奏曲；涝河桥战斗则使宁夏兵团主力一二八军中最坚固的防御工事、最顽固的反动势力遭到致命打击。(据《吴忠日报》)

将核辐射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的开路人(四)

——宁夏农林科学院核辐射研究应用专家归国华侨陈桂松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宁夏物理研究所后来划归了自治区农林科学院，陈桂松也成为农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当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得到的信任不多，农科院很多研究人员都先后被派到各地农村，陈桂松被分配到贺兰县一个公社，与当地的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多人对此种工作方式不习惯，但他却对此有某种如鱼得水般的轻松。

因为他喜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实际中，又因为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贺兰的这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在想着干点啥。他住的生产队没有电，他到县里找县委书记，帮助全村农民通上了电。看到农村打场时用驴拉碾子很辛苦，又动手为农民制作了个电动石碾子，结束了用驴碾子打场的历史，还将生产队的一片废水塘改造成农田，推广了机械播种新技术，工作都得到了县委书记的认可。

陈桂松：我考察过后，发现八里桥有一个废弃的旧工厂，有台旧的变压器和大量的电线，我就去找县委书记，请他批准我们把变压器和旧电线都拆回来，给生产队通上电，书记同意后我就带着几个农民去干，不到一个月就通了电，老百姓特别高兴。我来之前，生产队打场时都是用驴拉碾子，我做了台电动机，带着碾子转，农民高兴坏了，省了力还省了驴，生产队原来有个大水塘，占了很多地，我又去找县委书记，请他批准我们在路边开一个口子，把水放掉变成地，书记一听是我提出来的想法，马上同意了。李书记特别信任我，还对其他人讲，只要是陈老师提出的事情，就去照办，不会有错。后来开垦出很多土地，附近的生产队还来抢地。我还去农业厅给生产队要来一台播种机，亲自教农民使用，县上还召开现场会，搞技术推广。

在农村生产队的劳动让陈桂松收获了农民的尊重和领导的信任，也让他的知识有了些施展的空间。但远离科学研究的苦闷和对政治运动的不解常常让他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两年后，科技人员开始归队，陈桂松又回到了自治区农科院，分派给他的新的任务是巨大的考验，国家计划在西北开展放射性物质应用研究，请他从白手起家中把课题承担下来。

放射性应用研究极具开拓之先，还具有一定的风险。当时此项研究尚属空白。没有经验、也没有可参考的范例，他只能边学边摸索着干，钴源是放射性元素应用的核心，一般的钴源体积不会超过一支香烟，尽管体积很小，但杀伤力极强，如果在失去保护或保护不当的情况下，被钴源照射时间超过十秒即会造成生命危险。

让钴源按人的意志发送放射线，必须先建一个“钴炮室”，就是把钴源的放射性射线控制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不仅控制放射线的剂量，还要防止放射线外泄，使放射剂量、放射目标、放射方向都精准如炮弹，时间还需毫秒不差。

陈桂松：放射性元素对人体有很大伤害，对各种有害生物也有很大杀伤力，我们的研究就是通过新建的“钴炮室”控制钴源的放射线剂量，把杀伤力应用到生产领域，既不能让钴源伤人，又不能让它伤害作物，只让它在人的控制下去杀虫、杀病菌，消灭有害物质。在这之前，我们国家对放射性物质的应用还处在探索阶段。国家当时规定很明确，没有结过婚的人不准介入到这个领域。

(蒲银生 整理)

我是一名移民的后代(二)

——记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区划办公室主任王文祯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1961年6月我们中专毕业，我们班的同学分配到农业科研院所、农垦和劳改系统，我和9名同学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国营平吉堡农场，参加农垦建设。我本是一个陕西移民，没曾想到到宁夏以后，经过自己的努力，一个华丽的转身，成为了建设宁夏的一名科技人员。

我们家来到的这个移民点是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干水井大队，虽然离黄河不远，但也是一个缺水的地方。在陕西农民们种植的都是传统的旱作物，来到宁夏以后，开始学习种植水作物，打破了传统的耕作模式，让世代代的农民又开始了重新学习耕作方法，让这些移民们很不适应。这里的风沙气候也是移民们不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时候的天气，移民们早上起来，被子上已是风沙点缀，门窗也被风沙堵塞，甚至睡觉人的口腔里，也是沙子硌牙，这是在陕西不曾想象的气候天气。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三门峡水库移民地区减少，我的家乡也在其中，政府不但让我们移民返回，而且我们家乡的原址被一个部队的农场占用，所以移民的返乡愿望非常强烈。

解放前我的父亲因为躲避官司，逃跑到了南京，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淘到了一份工作，由于多年没有回家，就在那里找了个对象，我父亲是有文化的，初中毕业，结婚以后他那边也有孩子了，解放以后他又回到了陕西老家，那时候没有离婚这一说，回来以后我们这个大家就分家了，一家分为三家，我伯父一家，我们一家，最后我伯父在山西安家，我父亲在老家大荔县安家，我母亲带着我们一家毅然决然地头也不回来到了宁夏。

为什么当时来宁夏，很大的原因是我母亲，我母亲当时生气地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呀”。母亲带着我们一家毅然决然地头也不回来到了宁夏。

经过陕西移民的共同努力，1963年母亲带着只少了我一人的一家，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的陕西老家，被安置到了离老家不远的陕西合阳县农村。因为我已经有了工作，要回陕西只能以移民回迁的办法解决，最后我只有留在宁夏。

我是1961年的7月分配到了平吉堡农场，当时一起去了9个人，我就是其中带队的一位，我分配到平吉堡农场的基建股(科)，负责农场的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工作，回忆在平吉堡农场的这19年岁月，我是快乐和幸福。中专实习的地点是在平吉堡挖西干渠的时候，从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实践经验，在永宁修建宁化桥的时候，就是我们修的。把我们学到的水利知识充分运用到实践中，我是很欣慰的。我在平吉堡获得过五好青年荣誉，还到银川饭店开过会。我是1967年结婚的，媳妇也是从老家找的，结婚以后把媳妇带到了农场，成为平吉堡奶牛场的职工。我因为工作表现突出，1970年被提拔为农场基建科副科长。

1979年我调往广播电视台，负责罗山广播电视台转播塔建设的任务，任命我是广播电视台基建科副科长。1980年又来到宁夏广播电视大楼项目部，1984年广播电视台大楼土建基本完工，1985年自治区又成立宁夏工学院，实施基建项目，又把我调到宁夏工学院，工作了1年多，1986年我又调往自治区计委农业处工作，最后又调到计委下属的区划办公室工作。

2000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要在世界各地有选择地开展节水项目的实验工作，由于我在区划办公室工作突出，被确定实施了这个项目，叫做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实施节水宁夏项目办公室，我就成了这个节水项目办公室的主任。

(祖宁平 马晓虎 整理)